
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公共设施使用特征

——以虹锦社区为例

【摘要】：上海近 450 万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形成巨大的压力。以虹锦社区为例，通过对中心城区典型流动人口聚居地的实地调研，探索流动人口使用城市公共设施的基本特征，寻找与本地居民的差异，并总结其演变规律，以加深对流动人口消费生活方式的理解，为城市规划应对流动人口的高速集聚提供参考。

【关键词】：流动人口，中心城区，公共设施，使用强度，变化规律

1 研究目的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上海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其流动人口规模已近全市总人口的 1 / 4，并以 30—40 万人 / 年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集聚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对城市的日常运营形成了空前的考验：一方面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供应方面压力剧增；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固有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城市不能以普通市民的标准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不断膨胀、变化的特殊群体，如何提高城市服务水平、适应流动人口集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研究和解答。

我国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从 1980 年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到 1990 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的属性特征研究（丁金宏等，2005；张庆五，1991；宁越敏，1997 等）；从人口流动的动力因素分析（蔡昉，2000；陈吉元等，1993；王桂新等，2008），到流动人口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朱宇，2005；辜胜阻、刘传江 1996）；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从严格控制为主向管理和服 务并重转变，颁布了大量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如居住证制度、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等，出现了从“限制”到“容忍”，进而实现向“融入”的转变。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由宏观向微观转变的趋势，流动人口的微观生活正逐步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之一。如对流动人口的聚落形态与功能结构研究（吴晓、吴明伟，2002）；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研究（黄怡，2005）；以及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研究（李梦白、胡欣，1991；罗仁朝，2008）等。但是，关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设施使用特征的相关成果，尤其是实证研究，还不多见。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尝试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出发，选取以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心城区典型流动人口聚居地的实地调研，探索流动人口使用城市公共设施的基本特征，寻找与本地居民的差异，并总结其演变规律，以加深对流动人口消费生活方式的理解，为城市规划应对流动人口的高速集聚提供参考。

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并以设施使用频率和年消费额为主要指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按不同的公共设施种类与等级，对流动人口使用公共设施的强度特征进行分类分级研究，揭示其与本地居民的差异，划分使用层级，并总结演变规律。

2 案例及数据调查

2.1 虹锦社区介绍

本研究选择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虹锦社区为调查对象。虹锦社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南部的田林地区，介于城市中、内环线之间（图 1），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用地面积不足 10 平方百米的社区内集中了近 1.9 万名流动人口，占社区总人口比重达 95%以上，人口密度高达 19 万人 / 平方千米，具有流动人口集聚地的典型特征。



图 1 虹锦社区位置

从区位来看，虹锦社区与市级中心、市级副中心、地区级中心的时距分别为 40min、20min 和 5min，处于各级公共中心的有效服务范围之内，确保各级设施研究的全面性。

为了揭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公共设施使用特征差别，选取与虹锦社区比邻的桂林苑 1-3 号、冶金小区的本地居民作为参照样本，使用同样的问卷对两地居民进行同样的调查。桂林苑 1-3 号、冶金小区居住着典型的上海市普通居民，他们的公共设施使用状况可以代表上海市的普通人群。

2.2 数据获取

本课题组分别于 2008 年 5 月和 9 月对虹锦社区流动人口及桂林苑 1—3 号、冶金小区居民使用各类型、等级设施的基本情况（消费频率、单次消费额等内容）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通过居委会随机发放问卷 650 份，有效回收 5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15%；其中流动人口样本 382 份，本地居民 152 份。

2.3 样本基本属性分析

从性别与年龄结构来看，本地居民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年龄结构以中年为主，呈正态分布。与之相比，流动人口男性居多，约占 54%；且以青年为主（37.60%），中青年（28.80%）和中年人（27.30%）次之，而中老年的比例极低。相对本地居民而言，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更为年轻化。从文化程度来看，流动人口以初中为主，约占样本的 47.9%；其次为高中或中专，占 32.20%；低学历者约占 12%；高学历者则不足 8%。而本地居民中，大学及以上学历者超过 1 / 4。对比显示，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总体上低于本地居民，尤其是高学历群体差异显著。从收入情况来看，50%以上的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750-1700 元 / 人·月），中等收入（1700-3000 元）占 26.20%，更有近 12%在最低收入水平线以下，而中高收入以上的仅占 11%。折算均值，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约为 1838.75 元。而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主要集中于 1700-6000 元 / 人·月，平均人均月收入达 2638.25 元。从支出情况来看，60%以上的流动人口的家庭人均月支出在 600 元以内，而本地居民家庭人均月支出水平超过 600 元的占近

90%，两者差距显著。折算均值显示，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人均月支出为 692.55 元，仅约合本地居民的一半。综合收支情况，流动人口的收支比约为 1：0.38；而本地居民为 1：0.51。

3 使用强度的静态差异分析

流动人口，作为“都市里的村民”，始终生存于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中，而其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更是加剧了这种碰撞。利用实证调查的统计数据对流动人口使用不同类型、等级的公共设施的基本特征可找出与本地居民存在的差异。

3.1 商业设施

商业设施按等级可分为“市级中心-市级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4 个类型。流动人口使用这些设施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级商业设施的使用情况
Tab.1 Utilization of commercial facilities

		市中心	副中心	地区中心	社区及以下
频率	流动人口 a	3.26	3.50	9.36	13.79
(次/人·年)	本地居民 b	8.75	8.32	17.52	3.95
频率之比(流动/本地)c=a/b		0.37	0.42	0.53	3.49
年消费额	流动人口 d	662.33	658.77	1141.62	760.13
(元/人·年)	本地居民 e	4248.39	3175.87	3309.61	332.07
年消费额之比(流动/本地)f=d/e		0.16	0.21	0.34	2.29

3.1.1 基本特征

从频率来看，流动人口使用最为频繁的商业设施是社区及以下级，其次为地区级，最后是市级副中心和市级中心。可以发现，随着设施等级的提升，流动人口对设施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

从消费额的分配来看，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中低等级设施的消费，其中，地区级商业中心占据了日常消费的最大份额，约 35%；而其他三级设施的消费额则较为平均。这是因为通常在高等级设施消费的商品价格高，虽然频率偏低，但总消费额仍占有一定的比例；而社区及以下级设施的情况正相反；地区级设施则介于两者之间，既拥有较高的商品价格又拥有较高的消费频率，因而份额最大。

综合来看，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是流动人口最为倚重的商业设施；地区级商业中心则是流动人口的消费重心所在；而对市级商业中心与副中心的使用偏低。

3.1.2 与本地居民的差异

与本地居民的对比显示，无论是使用频率还是消费额，流动人口对市级中心—市级副中心—地区中心商业设施使用强度都低于本地居民，只有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使用超越本地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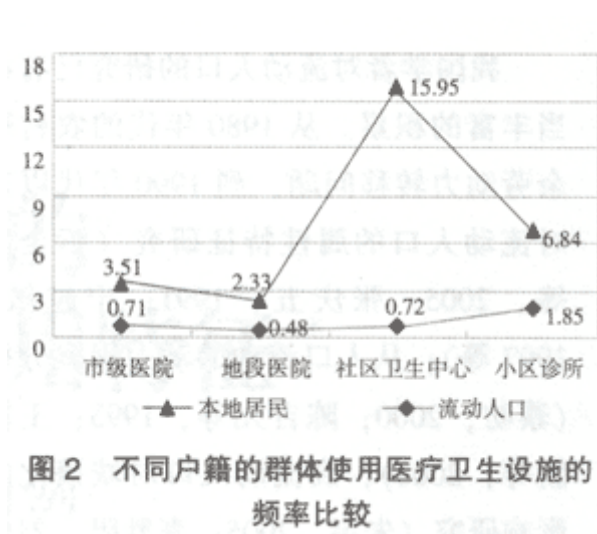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准确度量两大群体在各级商业设施使用上的差距，笔者计算了频度与消费额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比值，如表 2 中 c、f 栏所示。与本地居民相比，除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外，流动人口对商业设施的使用率不足本地居民的一半，且呈现出设施等级越高，差距越显著的特点。而在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的使用上，流动人口则大大超越了本地居民，分别达到了本地居民的 3.49 倍和 1.73 倍，成为这一等级设施的主要使用群体。这表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商业设施的选择上存在显著的偏好差异，以流动人口倾向于使用低等级的商业设施为特征。

3.2 公益性设施

公益性设施种类繁多，本研究根据设施需求刚性的强弱，选取刚性较强的医疗卫生设施、中等刚性的文化设施以及刚性较弱的休闲娱乐设施作为典型，以频率为主要指标，考察这些设施的不同等级的使用情况。

3.2.1 医疗卫生设施

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对医疗卫生设施的使用较少，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区诊所也低于人均每年 2 次。而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图 2），流动人口对市级、地段、社区医院、小区诊所的使用频度分别仅为本地居民的约 20%、20%、5%和 25%，差异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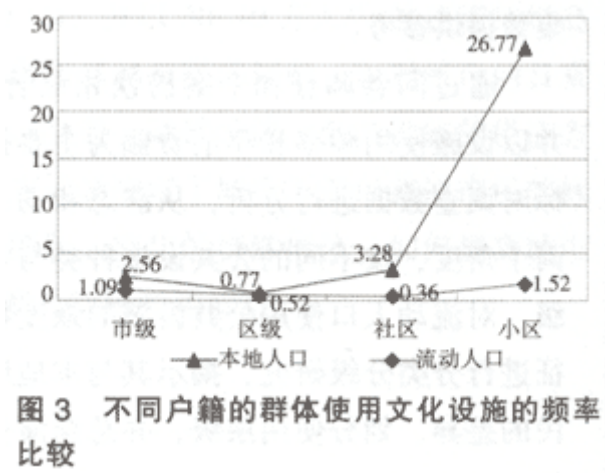


客观上，这是由于流动人口以中、青年为主，健康状况良好，故较少就医。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价格。对流动人口就医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381 例有效样本中有 97 例选择去私人小诊所或直接去药店买药，比例超过了 1/4。可见，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在主观上排斥就医，而“看不起医生”则成为多数受访者的一致感叹。

3.2.2 文化设施

总体情况与医疗卫生设施类似，流动人口很少使用文化设施。这是因为流动人口来沪通常以务工为主，繁重工作几乎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鲜有热情关注文化生活。而另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流动人口对小区级（1.62 次/人·年）和市级（1.09 次/人·年）文化设施的使用明显高于街道和区级设施，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

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图 3）显示，流动人口使用文化设施的频率约为本地居民的 10%；且差距随着设施等级的降低而递增，尤其是小区文化设施的使用仅为本地居民的 5%左右。



3.2.3 休闲娱乐设施

流动人口对休闲娱乐设施的使用呈现出设施等级越低使用越频繁的特点，尤其是对小区娱乐设施的使用。这是因为流动人口中，年轻人较多，休闲娱乐的需求较强；而小区内的游戏厅、网吧等几乎是他们日常娱乐的唯一选择：价格低廉，使用方便，且彼此熟知、人际关系好，“玩得有气氛”。而一些市级设施，如大剧院、高档游艺场等，则往往由于高昂的价格使他们望而却步。

而本地居民的情况正相反，一些低端的游艺场所由于环境治安等因素并不受欢迎；而一些专业的影院、歌城等设施因为较高的品质而受青睐。因此，两大群体对各级娱乐设施的使用频率分布呈交错状，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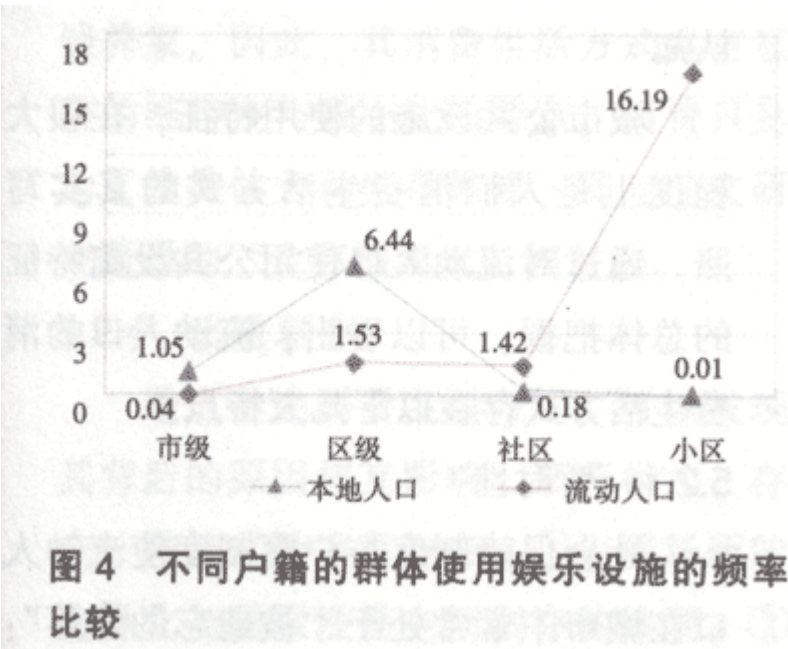


表 2 流动人口使用公益性设施的频率统计

Tab.2 Usage frequencies of public facilities by floating population

	医疗卫 生设施	文化 设施	休闲娱 乐设施
频率(次/人·年)	2.76	3.47	19.18
与本地居民的比值 (以本地居民的频 度为 1.0)	0.096	0.101	2.210

综合比较这三类设施（表 2），流动人口对公益性设施的使用普遍较少，且不但没有呈现随设施刚性增强使用增加，反而出现减少的特殊现象。所谓刚性，对流动人口来讲，不是绝对的。

4 流动人口群内设施使用特征分异

流动人口在整体上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群体；但时间的推移也使群体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异。从收入水平的调查中发现，约有 11%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中高收入的水平，显然，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流动人口正不断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对公共设施的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借鉴政治经济学消费层级理论，构建公共设施使用层级指标体系，以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三种模式对使用特征加以划分，测度流动人口群内设施使用差异。生存型使用模式用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属于最低级的消费层次，主要包括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发展型使用模式用于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获取个人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是在满足生存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的，主要包括地区级商业中心 / 街与文化设施；而享受型使用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是消费的最高层次，主要包括市级商业中心/副中心与高等级娱乐设施。

4.1 基于收入的使用特征变化

以 2007 年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最低收入保障线为基准，将家庭人均月收入划分为低收入（750 元 / 人 · 月以下）、中低收入（750-1700 元）、中等收入（1700-3000 元）和中高收入（3000 元以上）四个等级。通过“使用层级指标体系”计算发现，以 1700 元从. 月为界线，各项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享受型指标的另一个更显著的拐点出现于 3000 元 / 人 · 月的收入水平（表 3）。这表明，当流动人口的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其对公共设施的使用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而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时流动人口开始注重对高等级设施的使用。纵向来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对公共设施的使用以生存型和发展型为主；中等收入群体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强度明显高于前两个特征群体，但总体上仍处于生存型和发展型阶段；而中高收入群体对设施的使用则表现出一种“质”的提升，初步具有享受型使用模式的特征。

表 3 基于收入水平的使用层级指标体系

Tab.3 Index system of usage hierarchy based on income

月收入水平(元/月)			<750	750-1700	1700-3000	>3000
A 人均月支出			413	501	894	1400
B1 享受型	B11 市级商业中心/副中心 B12 高等级娱乐设施	频率	1.76	2.89	3.48	6.02
		消费额	206.77	472.51	888.81	2095.67
		频率	0.06	0.31	3.54	3.96
B2 发展型	B21 地区级商业中心/街 B22 文化设施	频率	6.89	8.92	10.32	10.35
		消费额	635.31	961.41	1519.81	1532.89
		频率	0.5	2.42	1	0.57
B3 生存型	B31 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	频率	17.2	18.85	25.01	32.13
		消费额	737.69	974.35	1596.6	1916.68

4.2 基于居沪时间的使用特征变化

将流动人口的来沪时间划分为短期（0.5-1 年）、中期（1—4 年）、长期（5 年及以上）。计算结果显示（表 4）：流动人口在居沪的短、中、长期收入和支出水平保持稳步递增的态势；而当流动人口居沪时间超过 5 年后，层级性指标出现一次比较显著的增长，尤其是享受型使用模式的指标几乎翻了一番。这表明，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而 5 年是一个较为显著的时间节点。但从纵向来看，流动人口的这三个特征群体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均以生存型和发展型为主导。

表 4 基于居沪时间的使用层级指标体系

Tab.4 Index system of usage hierarchy based on duration of residence in Shanghai

居沪时间			0.5-1 年	1-4 年	5 年及以上
	A1 人均月收入		1419.15	1853.43	2316.07
	A2 人均月支出		348.31	388.43	428.57
B1 享受型	B11 市级商业中心/副中心 B12 高等级娱乐设施	频率	2.90	2.93	4.48
		消费额	528.30	598.25	1060.43
		频率	1.92	0.61	2.52
B2 发展型	B21 地区级商业中心/街 B22 文化设施	频率	8.11	9.50	11.23
		消费额	941.35	1133.49	1533.58
		频率	1.10	0.47	4.79
B3 生存型	B31 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	频率	16.07	21.21	31.93
		消费额	774.28	1222.45	1989.83

4.3 基于留沪意愿的使用特征变化

根据不同来沪意愿将流动人口划分成“进城务工几年后返乡”的短期过渡群体和“进城务工并打算扎根于城市”的长期发展群体。计算结果显示（表 5）：长期发展群体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强度明显大于短期过渡群体，前者表现出强烈的享受型使用模式，而后者则以生存型使用模式为主导。从层级性指标的比较来看，两特征群体间的差距随着使用层级的提升愈发显著。显然，不同来沪意愿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预期，因而对公共设施的使用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表 5 基于来沪意愿的使用层级指标体系

Tab.5 Index system of usage hierarchy based on willing to live in Shanghai

	来沪意愿		短期过渡	长期发展
	A1 人均月收入		1729.87	2339.89
	A2 人均月支出		651.69	840.43
B1 享受型	B11 市级商业中心/副中心 B12 高级娱乐设施	频率	3.84	7.13
		消费额	584.26	2373.36
		频率	0.18	5.16
B2 发展型	B21 地区级商业中心/街 B22 文化设施	频率	7.11	12.17
		消费额	668.75	1903.21
		频率	1.11	2.81
B3 生存型	B31 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	频率	21.65	31.70
		消费额	973.21	1827.93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存在较为显著的层级性关系：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在沪居住时间超过 5 年，并准备长期在沪发展的群体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带有明显的享受型特征。

5 结论与思考

5.1 结论

总体上，流动人口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从设施分类来说：①对商业设施的使用表现为：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是流动人口最为倚重的设施；地区级商业中心则是流动人口的消费重心所在；而市级商业中心与副中心对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②对公益性设施的使用率极低，且呈现出刚性越强使用越少的特殊规律。

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则显示，整体上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差异十分显著，表现在：①对商业设施的使用上，设施等级越高差异越大；但在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的使用强度上，流动人口超越了本地居民；②对公益性设施的使用上差异更为大。

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来说，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异。具有中高收入水平、在沪居住 5 年以上，具有长期在沪发展意愿的特征群体具有较强的享受型特征。换句话说，随着收入、居沪时间的增加以及来沪意愿的长期化，流动人口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具有向享受型变化的趋势。

5.2 对流动人口消费生活方式的基本认知

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消费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通过对流动人口使用公共设施特征的总体把握，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消费生活方式存在以下几点：

5.2.1 暂时性

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常常处于“被遗忘的角落”：流出地对他们“鞭长莫及”，流入地对他们“近”而远之。他们的社会关系几乎都在农村，与农村千丝万缕的关系客观上妨碍了其融入城市生活。从经济角度看，他们在沪务工收入与“举家迁沪”的成本相差太远，终究还是要回到家乡去。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在城市务工、回农村消费，这决定了他们的消费生活方式带有暂时性的特征。这一结果在此次对流动人口留沪意愿的问卷调查中得以印证：超过 70%的流动人口选择“暂时在上海工作，赚些钱就回老家”。

5.2.2 空间局限性

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对低等级公共设施的偏爱，在空间上的“投影”表现为生活场域的局限性——集中于居住地附近。对流动人口日常休闲活动场所的调查显示，一方面，55%以上的人选择在小区内活动，而看电视 / 听收音机、家务、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正规公共娱乐场所收费高，流动人口往往选择在聚居地打造属于自己的娱乐场所。他们开设了经营、服务、价格都比较适合流动人口需求的娱乐场所，如歌舞娱乐场、网吧、游戏厅等公共聚集场所，满足了流动人口闲暇时间想娱乐但又缺少适合场所的问题。这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方式适应的一种快速反应，但它在客观上“禁锢”了流动人口的生活场域。

5.2.3 维持性与最小化性

时间上的暂时性以及空间上的局限性，决定了流动人口的消费只具有短期效应，很难形成长远的消费计划。此外，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来沪目的就是挣钱养家。因此，其消费生活方式具有显著的维持性与最小化的特点。消费只是为了维持体力和生存需要，即与前文研究所说的“生存型模式”相对应。

5.2.4 多重剥夺

透过上述消费生活方式，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原因相互影响、环环相扣，存在一种链式的多重剥夺：①生活场所的边缘化与局限性是空间剥夺的体现；②非正规就业由于制度性歧视使流动人口感受劳动时间、制度的剥夺；③而劳动时间的剥夺导致对闲暇活动的剥夺；④居住区位的环境质量反映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资源可达性差，是对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资源的剥夺；⑤社会交往范围空间的局限，是城市对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剥夺，进而导致对向上流动机会的剥夺。正是在这种链式的重重盘剥之下，流动人口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恶性循环”。

5.3 规划应对

面对多重剥夺，城市规划在满足流动人口生活需求的同时，更应通过合理的公共设施配置，引导其走向真正的城市生活。

5.3.1 商业设施

从商业设施的使用特征来看，流动人口对市级设施的贡献微乎其微，而对社区商业设施则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此，商业设施的规划配置应以改变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目标，注重引导其消费向高等级设施转移，在挖掘消费潜力的同时实现生活水平的改善。具体可分为“两步走”。近期，在规范社区级商业设施的基础上，完善地区商业中心网络的建设。地区商业街是流动人口的消费重心所在，根据此次调查，在 375 名有效的流动人口样本中，在地区商业街无消费行为的群体人均月消费 563.79 元，而有消费行为的群体为 716.56 元，是前者的 1.3 倍；也就是说，地区商业街可以拉动流动人口近三成的消费量。可见，地区级商业中心在引导消费、提升服务水平方面的作用。远期，提升市级中心、副中心的服务覆盖率，包括空间和内容两个层面。根据使用特征的动态变化规律，达到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消费能力分别为 894 元 / 月和 1400 元，是中低收入阶层的 2-3 倍；而具有留沪意愿的群体人均消费水平为 840.43 元/月，约合短期务工群体的 1.5 倍。长远来看，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及留沪意愿将随之得到长足的提升，消费转型成为必然。因此，在远期需要提升市级设施的服务能力。

5.3.2 公益性设施

由于公益性设施的种类多，且设施之间的区别较大，因此其规划对策需因势利导：①医疗卫生设施。流动人口对医疗卫生设施的使用极少，且倾向去社区卫生站就医，表明流动人口的集聚对“市级资源紧缺、社区资源充足”的城市医疗资源系统的冲击并不大。因此，近期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的压力较小，而应从医疗保障等相关方面入手，提高流动人口对医疗设施的使用率，在充分发挥低等级医疗设施功效的同时，保障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流动人口经济能力的提升与观念的转变，其对高等级医疗设施的需求将得到释放，城市规划应对此提前做好预案与准备；②文化设施。流动人口对文化设施的使用极少，设施供给的压力主要集中于社区内部。为此，规划必须加强社区文化活动室、图书室等相关设施的配置，缓解当前在本地居民需求压力下已难堪重负的窘境；③休闲娱乐设施。目前，流动人口对娱乐设施的使用强度极高，且对社区内部设施偏好十分显著。在近期规划中应加强对低端设施的管理，使之规范化。远期来看，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流动人口对娱乐设施的需求将逐步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规划应对此状况加以关注，做好预案。